

文化马克思主义 在战后英国

WENHUA MAKESIZHUYI ZAI
ZHANHOU YINGGUO

——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

丹尼斯·德沃金 著
李凤丹 译



人民出版社

文化马克思主义 在战后英国

——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

丹尼斯·德沃金 著

李凤丹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杜文丽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徐林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
起源/丹尼斯·德沃金 著 李凤丹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1-007502-0

I. 文… II. ①德…②李…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英国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9261 号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

WENHUA MAKESIZHUYI ZAI ZHANHOU YINGGUO

——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

丹尼斯·德沃金 著 李凤丹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29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502-0 定价:3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译者说明

本书中英文姓名的翻译基本参照《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此书由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第1版于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引用的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4版。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人名。Caudwell 在《手册》中被译为考德韦尔,但因为 Christopher Caudwell 在常见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中普遍被译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为便于阅读和理解,这里采用通用译法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ilde 在《手册》中被译为蔡尔德,而 V. Gordon Childe 通译为 V. 戈登·柴尔德,译者采用通译姓名。Michael 在《手册》中被译为迈克尔,译者在本书中也遵循这种用法,但值得提出的是 Michael Foucault,因为通译为米歇尔·福柯,因此译者采用米歇尔一词。Jameson 在《手册》中被译为詹姆森,译者遵循这种用法,但 Fredric Jameson 在通常著作中还被译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杰姆逊,还有詹明信,这里特别提出。还需要提出的是 Popper 一词,《手册》中将其译为波珀,译者遵循这个翻译,但现在 Karl Popper 通常被译为卡尔·波普或者卡尔·波普尔。

与英文原书采用尾注不同,译者采用的是脚注,每页重新编号。

致 谢

(vii)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大量知识上的帮助。它最初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我要感谢拉塞尔·伯曼的友谊,我们知识上的志趣相投,他首次使我注意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我也要感谢艾拉·卡茨纳尔逊,在他的指导下,我初次阅读了佩里·安德森,爱德华·汤普森以及雷蒙德·威廉斯。这本书中关于文化研究的许多观点最初在芝加哥大学大众文化研讨会上被提出和检验。与参与这次研讨会的两个朋友——阿瑟·奈特和洛伦·克鲁格的讨论,对于我博士论文的写作尤其重要。我感谢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委员们——利奥拉·奥斯拉德,基思·贝克和简·戈尔茨坦,感谢他们对我论文的建设性批评。我尤其要感谢委员会主席彼得·诺维克的鼓励、友谊,以及严肃和公正的批评。

我要感谢那些我在1984年在英国采访过的人,那时我和他们一起讨论过我的研究。限于篇幅,我不能对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不能完成博士论文和这本书。我要感谢那些我见过不只一次的人,他们与我一起分享了主要资料,他们邀请我吃饭或者去酒吧:萨利·亚历山大,安娜·达文,后来的艾伦·霍尔,斯图亚特·霍尔,凯瑟琳·霍尔,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理查德·约翰逊,维克托·科尔南,迈克尔·拉斯廷,比尔·施瓦茨,芭芭拉·泰勒,后来的

爱德华·汤普森,彼得·沃斯利以及罗伯特·M. 扬。

作为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历史系的成员,我写了这本书,这个历史系的成员大多数是文化的和知识的历史学家,在美国大学里面,这样的历史系是很少的。我所有同事都很支持我,而其中的三个(也是朋友)要特别提及:与马尔塔·希尔德雷思关于文化的和历史理论的多次对话;(viii)伊丽莎白·雷蒙德对我的知识和道德支持,还给了我编辑上的专业意见;还有斯科特·卡斯珀,他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我的手稿,听我边想边说,并总是询问一些适当的问题。此外,我要感谢珍·亨特利—史密斯,她为这本书作了校对和索引。

我要感谢杜克大学出版社对我及手稿的专业的对待和尊重。我要感谢杰夫·埃利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发人深省的批判;感谢鲍勃·米兰登帮助我改善了我的文体使其清晰;感谢帕姆·莫里森给予我鼓励。在这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我还要感谢肯·威索克,他对这个计划有信心,并且使这个计划得以完成。我也要感谢马克·波斯特,当这个手稿是完整的博士论文时,他批判地阅读了这个手稿。

最后,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格雷思和乔,我的兄弟肯尼思,他们多年来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的知识追求,我的妻子阿梅利亚·柯里尔给了我爱和友谊,我的儿子萨姆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给了我无法言喻的快乐。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失去的权利	/12
第二章 全力以赴的社会主义	/64
第三章 文化是普通的	/111
第四章 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	/171
第五章 自下而上的历史	/250
第六章 理论政治学	/301
结论	/337
索引	/359

导 言

1983 年的一个会议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阐释》的编辑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和卡里·纳尔逊指出,马克思主义处在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趋势的中心,它超越了传统界限,并将“文化实践的整体领域”作为其主体。编辑间接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很理想地适应于以上工作,是因为:

“它至少隐含地涉及,破除这些领域之间的隔阂,使每种必需品都成为可解释的活动场所——通过政治化可解释的和文化的实践,通过考虑文化生产的经济决定作用,通过彻底历史化我们对指示性实践的理解——从政治话语到艺术,从信念到社会实践,从心理学话语到经济学话语——当然还有通过继续修正和扩展具有多学科意义的理论体系。”^①

这部论文集从“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一标题下的一系列论文开始,它提出,“活动的复兴”同样经历着“定义的危

^① 《导言: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载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和卡里·纳尔逊等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阐释》,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 页。

机”。大体上说,对于已经发展了好几十年的非正统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不止一代历史学家、文学批判家、艺术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开始感受到兴奋、热情和忠诚,而这本论文集把握了这些感受。

《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的说明,这种说明针对的是一部分非正统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晚期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从福利国家的建立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福利国家的改革时期。我集中于研究学者和作家在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著作,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工作不用多介绍,包括罗德尼·希尔顿关于中世纪农民阶层的著作;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爱德华·汤普森关于理解18世纪大众文化和早期工人阶级的著作;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分工的历史,前工业反叛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许多著作和论文,以及拉斐尔·萨缪尔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关于19世纪的研究。以上这些与新社会的历史和被统治阶级的历史是同义的。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创造“自下而上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萨利·亚历山大关于工业革命中工人阶级妇女的著作,凯瑟琳·霍尔的关于工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的著作,希拉·罗博特姆关于妇女历史的大量著作,以及芭芭拉·泰勒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维度的恢复,对于建构新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历史是同样有力的声音。这些著作非常重要,它们不仅恢复了历史中女性的作用,而且通过集中于研究阶级的性别化特征以及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还有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它们为重新更全面地思索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与历史学家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文化研究者的成果,他们的国际性影响(尤其是在北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性繁荣”,这是澳大利亚人米格汉·莫里斯的描述。^①文化研究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为先导,并由哈泽尔·卡比、保罗·吉尔罗伊、迪克·赫伯迪格、安吉拉·麦克罗比和保罗·威利斯所推进,它提出了对媒体、青年亚文化、文学生产、当代工人阶级、种族和性的文化建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性质等问题的批判性理解。它的突出特点是,同时尊重被统治的和被边缘化的阶级和团体的潜在颠覆性文化,并敏锐意识到社会的意识形态力量,而这些阶级和团体也被涵盖于这个社会。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和理论上兼收并蓄的,它用文化领域的扩展概念,取代了大众传媒讨论中非常流行的传统的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二分法。

我不是第一个批判地考察这些历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希尔或文化理论家如霍尔、威廉斯——的人,我也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的人,这些研究对于社会和文化理论,对于与这些研究相联系的新左派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到现在为止,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文化研究这两个学科的组成部分,都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作品。但是许多作家要么试图宣传和阐释马克思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著作,要么从内在于那些学科的立场出发,提出通常实际上是政

① 米根·莫里斯引用了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卡里·纳尔逊和葆拉 A. 特莱希勒编辑的《文化研究》,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2年,第1页。如这卷的编辑所指出的,这种描述表达了文化研究的流行程度,并指出了它的流行性。思索的规则——每次繁荣都伴随着萧条——是否适用于文化研究,仍然可以看到。

治性的批判的阐释或辩护。^① 我的解释,是研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思想史,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看成一个连贯的思想传统,不局限于某个学科或其中的某个人物。由于这个传统中的两位巨匠——汤普森和威廉斯的去世,这个工作显得尤其有价值。

我根据建构性的,但绝不是和谐的对话和辩论来研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这种对话和辩论是在历史学和文化研究这两个学科之间和内部进行的。存在争论的问题是,文化与社会之间,结构和动力之间,经验和意识之间,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不能被孤立地考察;它必须放在英国左派危机的背景下研究,而这个危机实际上与战后的时代背景相联系。这一危机的深刻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改革之后变得明显,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保守主义统治期间,它的特征开始形成。我不是说,所有将要被讨论的著作都是为了回应社会主义和英国左派危机,虽然这在许多情况下是真实的。我要说的是,如果从这个危机的角度来研究,我们能够学到更多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

① 第一种包括帕特里克·布朗特林格,《克鲁索的足迹: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研究》,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0年;哈维J.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初步分析》,剑桥:政治出版社,1984年;格雷姆·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波士顿:恩文·海曼出版社,1990年。第二种包括大卫·哈里斯,《从阶级斗争到享乐政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2年;布赖恩D.帕尔默,《爱德华·汤普森:反对和对立》,伦敦:维索出版社,1994年;茱莉亚·斯温德尔斯和莉萨·贾丁,《什么是左派:文化和劳工运动中的女性》,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0年。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是林春,《英国新左派》,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3年。虽然林春和我都记述了对于许多相同东西的看法,但是我们是从非常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她分析了新左派历史,从而“帮助我们解决未来重建社会主义的艰难工作”。《英国新左派》,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页。我对新左派的分析集中于对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史学和文化研究知识。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源于努力确立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解,这种理解考虑了战后的变化,这些变化似乎逐渐破坏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设想,这些变化还质疑了传统左派对政治和经济范畴的绝对依赖。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首要关注的是:重新定义结构和动力之间的关系,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动力即工业的工人阶级正遭受质疑。他们试图认识战后研究的特征,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抵抗形式。在这个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化”。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就这点而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主流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斯大林主义、机械主义和经济主义——划清了界限。斯图亚特·霍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定义为:“在马克思主义周围进行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试图进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①这句话可以用来指示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关系。

或许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更详细的图景,可以通过将其与另一个传统进行比较和对比而被描绘出来,这一传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它影响了当代的文化讨论,它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于一战后,由于俄国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经历而形成,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列宁先锋主义的哲学替代品。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生活的文化和意识

^①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载于格罗斯伯格,纳尔逊和特莱希勒编:《文化研究》,第279页。

形态维度,他们典型地试图将社会理解为“总体性”,非常关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主体的消失。像葛兰西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主张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换句话说,他们反对这样一种简单化的信念,即资本主义的瓦解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可由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规律来保证。^①

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英国传统也建立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它强调社会生活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并且它的形成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西方国家革命运动的失败。但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如同它们的相似性一样明显。首先,虽然二者都承认,文化在保证民众对主导意识形态和现状的默认这一点上起了关键作用,但二者对当代文化却持非常不同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倾向于将当代文化看成低级民众的文化工业娱乐。这种文化鼓励民众将自己视为是被动的消费者,这损害了他们判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诱使他们默认主导的社会关系。而另一方面,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更具矛盾性。文化研究将大众文化看成潜在地具有颠覆性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论家试图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角度理解民众的文化消费;他们认为,人们的反应通常是有创造性的和多样化的。历史学家们也持同样的观点,虽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更早的历史时期。总体来看,历史学家的研究把文化领域看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进行争论的场所——作为“整体的斗争方式”的文化。并且他们对更早历史时期的研究暗示了,这种斗争在 20 世纪同样

^① 和其他地方一样,我这里的概括主要来源于马丁·杰伊《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概念的冒险》的导言,此书由巴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20 页。杰伊更一般性地写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但是他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似乎最适合于法兰克福学派。

是明显的。基于对文化的这种独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学家们普遍接受葛兰西思想,他的霸权斗争概念与历史学家们自己的概念是相适应的,并且还丰富了他们的概念。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是政治。虽然概括起来很困难,但是一般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相信,在一个历史时期,当理论和实践坚决拒绝联系在一起时,批判思维自身就是一种革命实践的形式。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在谈论卢西恩·戈德曼时所说,他们是激进知识分子,对于不是工人这一点,他们没有感到任何疑虑,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天生就是革命的。^① 大部分人同意列宁的观点,认为听之任之的工人能够得到的仅仅只有工会意识,但他们不认同列宁的先锋党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合法化了镇压异己的行为。有些人甚至根据原则,拒绝加入激进党。

法兰克福学派倾向于与工人阶级政治保持疏远,而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传统下的知识分子持续地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斗争。他们与工人阶级和激进运动之间从来没有无问题的联系,但是他们倾向于将他们知识分子的工作看成是,以某种方式对那些运动作贡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文化理论,是在近60年时间里,在最激进的目标和运动的背景下,通过七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而产生的: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民阵线;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左派运动和核裁军运动(CND);1968年的反正统文化政治活动和学生政治运动;70

^① 马丁·杰伊《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概念的冒险》的导言,由巴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年代的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和反种族主义政治活动。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知识分子的技巧运用于阐述被统治阶级和团体的经历和目标,并且他们尝试着去理解社会中约束工人阶级的力量。民粹主义的有力约束一直存在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之中。

毫无疑问,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之所以呈现了这样独特的形式,有许多原因,但是有两个原因值得注意。英国的工人和成人教育传统,尤其是工人教育协会,为知识分子和工人提供了独特的交流机会,并且这种环境为创立文化研究,为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路径,起了很大作用。^① 这个传统的一些重要文本——霍加特的《有文化的用途》、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都是成人教育环境的产物。新的女权主义历史也是这种环境的产物。此外,由于教育机会的逐渐扩展,许多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确实不是大多数)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并且通过获得奖学金进入大学。霍加特和威廉斯毫无疑问是这些人中最闻名的,但他们决不是独一无二的。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在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之下,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都是哲学家,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影响来源于历史学家,文学和文化理论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将研究路径的区别归因于英国人的反理论的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并且这种想法确实有一

^① 这一点已经被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中反复重申过了,文章载于《现代主义政治:反对新国教派》,伦敦:维索出版社,1989年,第154—155页。

定道理。^①但是这需要作一点说明。虽然英国历史学家都是一些专家,他们一般都记述一些特定历史时期,但他们与欧洲传统下的哲学家一样,也关注对社会总体性的理解。实际上,他们独到地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旨在认识现代英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轨迹的集体计划。(见第1章的讨论)

此外,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与欧洲文学理论,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传统的拥护者进行批判对话,而这种对话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个过程与英国在欧洲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的过程是同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被这些传统和其他理论形式所吸引,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传统和形式是对英国经验主义习语的代替。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运用这些观念来扩展和更新而不是否定英国传统。到70年代末,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些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即使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科范围,但本质上是历史的,它决不是反理论的。

我在这本书中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一种批判的观念史。一方面,我试图仔细地重建这种传统的历史发展。因为它与政治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有必要将理论发展和主要文本,看做是与这种背景不可分离的。这种研究路径通常意味着,描述与激进政治运动和辩论相关的主要领导者。另一方面,我对这些东西

① 如马丁·杰伊所写:“大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实际上是大陆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总体性概念以更大的重要性。除了几个启发性地提及到,在威廉斯早期著作中,文化是‘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以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阿尔都塞浪潮到来,总体性才真正进入英国辩论视野。许多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学家,历史学科的特征是反对将概念一般化。”杰伊,《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第4页。

感兴趣:这种传统对文化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贡献,对左翼知识分子辩论的贡献,以及对理解当代社会成果的贡献,并且因此我试图批判性地评价它们的成就。有时候,我是通过重新创造理论辩论来做这些工作的,当主要作品出现时,这些辩论就会出现,以响应这些作品;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提出了我自己的批判和评价。这里,我通常是对许多重要文本进行细节性的原文分析,有时候是详尽分析那些将被许多读者所熟悉的文本。我做这种工作有两个原因:因为这种工作对于达到将这个传统看成一个整体的目标似乎是本质性的,并且因为我希望我的解释将被更广大的读者所理解,而不仅是被已经非常熟悉这个已被重新创造的传统中的主要文本的人所熟知。我并不将我自己看成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特殊思潮的一个信徒,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很清楚:我最认同由斯图亚特·霍尔和其他人所发展的文化研究传统后来的研究路径。

这本书由三个按年代顺序排列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1章)描述了在人民阵线和冷战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发展;它集中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这个小组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知识的发展非常重要,并且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形式有着重要作用。第二部分(第2、3章),我集中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新左派在创造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起的关键作用。基于战后变化,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以及它对文化政治学的研究,对文化研究的最初计划有启发作用,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路径的变化。第三部分由三章组成,但它的分章有点不自然。我在不同的章节中考察过20世纪70年代的成就,如关于文化研究(第4章),历史学(第5章),最后(第6章)是文化研究和历史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关于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热烈的和激昂的辩论,中心是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1978)中对这种马克思